

金瓶梅鑒賞辭典



封面题签：启 功

责任编辑：云复 瑜梅

《金瓶梅》鉴赏辞典

主 编 石昌渝

副主编 陈 锋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一 二 〇 一 工 厂 激 光 照 排

一 二 〇 一 工 厂 印 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4.75 插页：8 字数：1040 千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 000

ISBN7-303-00596-X/1 • 33

定价：25元

撰稿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韦凤娟	王宜庭	尹恭弘	石昌渝
付隆基	邓德萱	刘扬忠	刘传楣
李崇兴	许瑶卿	吴 郑	严昭柱
陈君保	钱 竟	崔洪海	韩光泽
谭邦和	黎懋雄		

怎样读《金瓶梅》

(代前言)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

十六世纪末，它还没有刊印，只是抄本在一个小圈子里流传，那时接触到它的少数文学家读后无不拍案叫奇。他们所以叫奇，当然不是着眼在《金瓶梅》的一些淫秽描写上。明朝万历时代，春宫可以画在折扇上，皇帝和臣子可以毫不隐晦地讨论男女房事，《金瓶梅》以那有限的淫秽描写在当时还不足以轰动视听。袁宏道(1568——1610)奇的是《金瓶梅》对明代贪欲享乐的萎靡世风的针砭，称它“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与董思白·万历二十四年丙申》)。谢肇淛(明万历进士)奇的则是《金瓶梅》对世态人情的细致、传神而又富于个性的描写：“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媒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曩枕席之语，狙豨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佞之谄唇淬语，穷极境象，駭意快心。譬之范工抁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金瓶梅跋》)

明末清初，《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在平话中称为四大奇书。《三国志演义》描叙了逐鹿中原、三国争雄的奇局，塑造了“智绝”诸葛亮、“义绝”关羽、“奸绝”曹操这样一些奇人；《水浒传》叙述了一群盖世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传奇故

事;《西游记》描写孙悟空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之九九八十一难,通篇充满神奇色彩。这三部作品描叙的都是超凡绝俗的人物和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而《金瓶梅》却是在呈现一部市井凡人的家庭生活,既无传奇式人物,也无传奇性故事,可是它简直是在精确地复制生活,没有概念模式的规范,也没有理想化的提纯的拔高,真实得毛发俱现,真实得残酷无情。这在小说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奇观,它问世之时即轰动文坛,是不足为怪的。

《金瓶梅》这部书,我们现代人读起来,也仍然会被它的写实精神所震慑。鲁迅评价它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中国小说史略》)。毛泽东则认为“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有人认为《金瓶梅》是客观主义的暴露文学,其实是一种误解。《金瓶梅》是一部愤世的书。作者对他所处的时代社会极其不满,这种不满几近于绝望。他以《水浒传》武松杀嫂的一段情节为引子,导出了破落户出身而飞黄腾达的西门庆,把读者的视线引向了西门庆的家庭生活,并又由这个家庭辐射开去,向我们展开一幅广阔的社会画面。他把人物安置在这种真实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让他们的心灵、情感和一切欲望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逼使读者面对丑恶然而却是真实的人生。

作者不满的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市侩封建主义。“市侩封建主义”这个词,作者头脑里是没有的,但这个词所包含的实际内涵,作者却是牢牢地把握住了。封建主义是指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它当然不是一个凝固的形态。在它全盛时期形成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我们姑且称它为传统

的封建主义。而这种封建主义到了明代，特别是到了明代中期，显然遇到了危机。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势力的壮大，金钱在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达官贵族们抛弃了鄙视商业的传统观念，居然也在作官之时另辟生财之道，搞起经商的副业来；而那些昨天还被传统观念视为贱民的棍徒，因为暴发有钱，居然也跻进官宦的行列，脸上浮着粗鄙的得意的笑，穿着腥红的官服在朝廷在地方大摇大摆。一方面是封建市侩化，另一方面是市侩封建化，封建和市侩结合起来，这就是“市侩封建主义”。在《金瓶梅》里，作者描写了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的当朝太师蔡京，这是市侩化了的官僚，描写了由暴发户当官的西门庆，这是封建化了的市侩。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为要牟取盐引暴利，宴请巡盐蔡御史，特在花园翡翠轩高烧银烛，备妓女侍候。

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爱厚？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别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于是月下与二妓携手，不啻恍若刘阮之入天台。

蔡御史是新科状元，西门庆则是一丁不识的市井棍徒，他们在财和色的面前融洽一体，外表儒雅，内里鄙俗，这就是市侩封建主义的境界。

西门庆是《金瓶梅》的主角。在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形象画廊里，他是独一无二的形象。他出场的时候只是一个生药铺的老板，还不能直接找县官说话，武松告他“夺妻杀夫”，他惶惶然，只能够找到皂隶李外传打探消息。几年以后，他家的客厅里不仅坐着巡按、御史大人，而且有钦差大臣堂堂太尉。他不再拜知县父母官，反过来，知县和地方文武官员都要走他的门路，去求巡按大人在例行的举劾中抬举自己。西门庆一人，竟然牵动山东一

省，其权势真是炙手可热。西门家的发家，主要不是靠了商业利润，主要是靠勾结官僚衙门和依仗手中的权力，巧取豪夺而来。他从湖州、杭州贩货回来，每次都要贿赂临清钞关的税务官，大偷大漏其税；他贿赂巡盐蔡御史，提前关下三万盐引，获取暴利；他贿赂山东宋巡按，垄断朝廷在山东的香蜡买卖和古董买卖；他握着清河县的理刑大权，贪赃枉法，仅苗青一案，便得银五百两；至于欺行霸市，压迫专一从事买卖的商人，则更不在话下。他在地方俨然一霸，贪鄙好色，枉法贪赃，为所欲为。作者描写清河县的几家皇亲都被西门庆压倒。妓女郑爱月正在王皇亲家里供唱，西门庆可以派军人传她立即出来，到他西门庆家来侍候。西门庆要建筑自己的庄子，可以强拆向皇亲的房子。而向皇亲的一座大螺蛳大理石屏风和两架铜锣铜鼓，却也以三十两银子的低价当给了西门庆。皇亲国戚跌落到要向西门庆这样的市井棍徒低头的地步，世道真是大变了，作者对于这样江河日下的世风，愤懑之中还糅杂有酸楚、悲哀、莫可奈何的感情。更为甚者，西门庆竟然跨入招宣府中，占有招宣的遗孀，并且不是十分情愿地收招宣的儿子为义子。西门庆所以能够这样飞黄腾达，关键在于钱的神通。他的理刑副千户的官职是用一副厚重的生辰担换来的。过往清河的朝廷大员，他都不惜重金进行贿赂。金钱转化为权势，反过来权势则转化为更多的金钱。西门庆这样转手几次，便成了权势和金钱的特大富翁。《金瓶梅》写的唯一的清官曾孝序要弹劾西门庆，但没有劾倒西门庆，自己的乌纱帽反弄丢了。显然，西门庆不是一个孤立的人，朝廷上有蔡太师这样的靠山，地方上有巡按府台庇护，左右有狐群狗党，下有地痞流氓，他不过是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样的政治局面社会局面不变，西门庆就倒不了。西门庆在腐朽的封建社会躯体上繁衍，他的繁衍，同时又加深着封建社会的腐朽。这样一个人物，决

不是什么新兴资产阶级前身的代表，而是封建势力在新的历史进程中的变种。尽管作者是从人性、道德的角度来批判他，但在客观上，他的社会性的反动和腐朽，是一目了然的。西门庆是纵欲身亡的，他死后，立即就有一个张二官来代替他。直到小说结局，蔡太师一伙被参劾倒了，但黄太尉仍在位，地方官吏依然如故。作者大概认为这个社会是无可救药了。他看到的是黑暗，黑暗，最后还是黑暗。

作者对社会现状不满，但他并不把这一切归结为社会制度的原因，他认为病根在人性的贪欲。小说正文前有酒色财气“四贪词”，开头就议论“情色”二字，话都是在当时小说中习见的套话，没有什么新意，但它们却有实在的内容，并不是空话。作者笔下，上至皇帝大臣，下至贩夫走卒，几乎没有不贪不欲的。皇帝虽未出场，但皇帝的花石纲却经过了清河县附近的运河河道，当时河中水枯，征集八郡民夫牵挽，弄得官吏倒悬，民不聊生。皇帝如此，蔡太师黄太尉宋巡按蔡御史李知县夏提刑等等概不在话下了。作者集中笔墨描写的是西门庆和他的第五房妾潘金莲。西门庆是贪欲的化身。“酒色财气”一应俱全，然而他追求最热的却是色欲。他的财富还不十分雄厚的时候，他的地位还不够显赫而且巩固的时候，他不得不把他精力的主要部分用于聚敛财富和攫取权力，第四十九回他挫败曾御史的参劾，意味着他的力量超越了政府的监督，良心和正义早已被他踩在了脚下，这时政府的权威在他的面前也瘫软下来。他已不必过分地为自己的钱财和地位的稳固而操心，于是他把全部身心都倾注在女人身上。胡僧授予他秘药，郑爱月向他提供可以追逐的女人的信息，他的欲求愈来愈炽，不管美丑良莠，一概兼收并蓄。欲望不但不受他的节制，反而处处支使他，直到把他变成自己的奴隶。几年之间，他就血枯髓干，终于死在了他孜孜以求的女人的石榴裙下。《红楼

梦》写了一个对于王熙凤单相思的贾瑞，瑞大爷所拥抱的是一个虚幻的美人，西门庆虽然搂着实在的潘金莲、王六儿、贲四嫂等等，但意念中浮现的却是不曾到手的何千户娘子蓝氏，他和贾瑞一样都死于难以填满的贪欲。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肯定受到过《金瓶梅》的影响，他曾把小说题名为《风月宝鉴》，意谓他的小说要为天下好色者戒。不过曹雪芹随即便摆脱了这种思想的羁绊，让自己的创作旨意升华到一个更高更宽更富于诗意的境界。

《金瓶梅》所描叙的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关系是极富讽喻和哲理的。西门庆把潘金莲当作泄欲的工具，作为回报，潘金莲也把西门庆当作泄欲的工具。潘金莲是西门庆的贪欲的外化，西门庆死在潘金莲手里也就是死在自己的贪欲手里。应当看到，作者对妇女的观念是极其陈腐的。他抱着“女人祸水”的观点，在小说开头便大讲女色祸国的故事，并且以潘金莲、李瓶儿和庞春梅三个“淫妇”的名字作为小说的题名，让西门庆堂堂六尺之躯断送在她们手里。陈腐的偏见左右了情节的总体构架，把生活的是非因果都倒置了。潘金莲在小说中是一个集旧式妇人恶习之大成的淫妇，美丽的皮囊包裹着一副五毒俱全的坏心肠，尽管她十恶不赦，但不能把一切责任推到她的身上。

然而《金瓶梅》形象所包孕的内容要远远大于作家的思想。《金瓶梅》的价值在认识方面而不在审美方面。作者所持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他不仅写出了真实的人的内心世界，而且也写出了真实的社会的大千世界。象西门庆这样的恶人，在《水浒传》中只是一个扁平的形象，而《金瓶梅》却赋予了他丰富复杂的多面的性格。坏人也是人。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描写的坏人，比那种“头上长疮、脚下流脓”的坏得透顶的坏人往往还更使人警觉，使人警觉身边的坏人，同时也警觉自己不要变坏。好人和坏

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拿破仑曾感叹：“从崇高庄严到滑稽可笑，相差不过一步之遥！”人生就是这样。《金瓶梅》忠实于人生，它摒弃了“好人一切皆好，坏人一切皆坏”的极端化的概念化的写法，既写了西门庆的贪鄙狠毒的一面，也写了他对妻妾、朋友们同情宽厚的一面；西门庆是只有欲而没有情的色狼，但对李瓶儿的死却表现了真实的悲恸。这种面向生活的两极汇合式的写法，是对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重大发展。《金瓶梅》对于社会的描写也是相当真实的，因为真实，便显得非常深刻。作者的政治思想，我看不及《水浒传》那样进步，他笔下的那些梁山英雄，实实在在是一群杀人放火的强盗。武松在这里，带着更多的粗野和凶残，小说描写他杀潘金莲的情形，要比《水浒传》的描写残忍得多。但是《金瓶梅》的作者忠实于他所描写的对象，不让主观成见左右自己的手笔，而是认真按生活实际情形写下去。在他的笔下，《水浒传》中良心未灭而胆小谨慎的佞作何九，也变成贪财趋势的小人；曾想庇护武松的知县，由于受贿，昧着良心不顾王法，要将武松置于死地。《水浒传》认为天下是贪官搞坏的，贪官不少，但毕竟不是官僚机器的全部，而《金瓶梅》则要悲观得多，它写了一个唯一的清官曾孝序，因为他清，他就要丢官，清官在那个社会是行不通的。在揭露社会真实情况这一点上，《金瓶梅》比《水浒传》要深刻和广泛一些。

然而，《金瓶梅》却长期被扣上“淫书”的恶名。判断一部书是不是淫书，现今西方一些国家都有一个法律的尺度，各国对这尺度在文字表述上略有差异，但其要义是相同的，即看一部作品是不是以宣淫，以挑逗、刺激性欲为目的。《金瓶梅》的确有许多男女床第行为的描写，就算这些统统都是色情描写吧，它们在全书中究竟占有多大的比重呢？如果删去它们，全书会不会空空如也了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金瓶梅词话》删除文字

共计 19161 字,这种删除是彻底的删除,它实在比现行的《红楼梦》还要“清洁”。这删除的文字在近百万字的全书中大约只占百分之二。经过删除的本子,原书的基本思想内容并没有受到损害。这就足以说明,《金瓶梅》的价值并不系于“色情”之上,因而扣不上“淫书”的帽子。

旧中国是一个礼教的社会,遍地都是道学家,虽然暗地里男盗女娼,嘴巴上却都是仁义道德。就在明代万历时期,《金瓶梅》抄本刚刚流传的时候,著名文人董其昌(1555—1636)就主张“决当焚之”,可是董其昌却是《金瓶梅》抄本的收藏者,袁宏道最初读到的抄本,就是从他那里借来的。沈德符(1578—1642)一方面说《金瓶梅》“坏人心术”,另一方面却又恨不得睹其全书。不能说董其昌和沈德符是道学家,但他们的这种矛盾的心态,说明了一些卓有见识的文学家也承受不了礼教传统文化的压力,似乎在读《金瓶梅》的时候,总应该先对它义愤填膺地声讨一番才是,否则,自己的趣味就将受到人们的鄙视。“东吴弄珠客”(疑为冯梦龙)在《金瓶梅序》(万历四十五年丁巳)中说《金瓶梅》“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余尝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这是对道学家们的一种俏皮而又尖刻的回答。鲁迅曾说道学家在《红楼梦》中只有见淫,我认为鲁迅是一针见血,读《金瓶梅》而生欢喜和效法之心的,小人禽兽之中大约有不少道学家。

《金瓶梅》这部小说因了“淫书”的名声,引起人们的好奇。其实,它没有传奇式的情节,也没有诗情画意的令人陶醉的描写,它写的是一个市井家庭的日常生活,妻妾的争风吃醋,恶棍的吃喝玩乐,完全是一幅市井社会的风俗画。但是《金瓶梅》的艺术创新正表现在这里。过去的长篇小说都是英雄传奇,《三国志演义》写的是历史的英雄,《水浒传》写的是江湖的英雄,《西游记》

写的是幻想中的英雄，而《金瓶梅》却转而来写世俗的凡人，这不能不说是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性的开拓。不单是题材，还有叙述方式、人物塑造、结构方式、细节描写和语言运用等等方面，都具有小说划时代的开创意义。郑振铎对此评论说：“《金瓶梅》的出现，可谓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在文学的成就上说来，《金瓶梅》实较《水浒传》、《西游记》、《封神传》尤为伟大。《西游》、《封神》，只是中世纪的遗物，结构事实，全是中世纪的，不过思想及描写较为新颖些而已。《水浒传》也不是严格的近代的作品。其中的英雄们也多半不是近代式（也简直可以说是超人式的）。只有《金瓶梅》却彻头彻尾是一部近代期的产品。不论其思想，其事实，以及描写方法，全都是近代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金瓶梅》准备了《红楼梦》的出现。叙述方式、结构方式对《红楼梦》的影响且不说，单是《红楼梦》的一些情节和场面描写，一些艺术表现手法，我们就可以指出数十处《金瓶梅》的胎记。毛泽东曾把《红楼梦》和《金瓶梅》加以比较，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一个时代的文学构成，按其阶层划分，可以分为民间文学、市民文学和文人文学。《金瓶梅》是市民文学的代表作。这倒不是因为写了市民的生活，主要是因为它反映了市民的心理和审美趣味。我不同意把中国的市民与欧洲的作为资产阶级前身的市民等量齐观，明代中晚期的市民带着浓重的封建色彩。但市民又毕竟与商业和手工业相联系，不同于封建地主阶级。市民的心理和审美趣味决定了《金瓶梅》的风格，决定了它的长处和短处，决定了它的优点和缺点，决定了它的精华和糟粕。作者对于自己所处的生活，有深切的体验，却没有凌驾，他是站在作品人物的同一水平线上，描写人物和人物的生活。这些描写是真实的。

却又是短视的。同是揭露黑暗,《金瓶梅》比俄国果戈理的《死魂灵》显得灰色,给人以一种压抑感和窒息感;同样是写人生的悲剧,《金瓶梅》没有《红楼梦》那样的理想的光照。《金瓶梅》缺乏爱心和美心,作品虽有真实却没有诗意。作者的审美趣味,虽然给我们展示出传统诗文所不屑涉猎的情感角落和生活方面,但在描写中却明显流露出轻薄和恶谑。不能说作者对于男女床第行为的描写都纯粹是色情描写,在总体上说,这些文字是有所寄寓的,反映了那个病态社会里男女之间的病态的肉体关系,揭露了鄙俗的功利主义,揭露了奴役和被奴役,对于这一点,比较稍后的传为李渔所作的《肉蒲团》便可释然了;然而作者的描写也包含有低级的趣味,因而使得这些描写好象是在客观地展览。这些描写对于一般读者之不适宜,是十分显然的。但是,我们不要误解,以为《金瓶梅》的糟粕全在这里。一部文学作品,其精华和糟粕是同在的,不能从章节文字篇幅上把它们割开,只有通过读者的理性,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达到真正的扬弃。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

白话小说在古代被看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俚俗的东西,创作小说在当时不但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而且还要遭到封建礼教的唾骂,作者一般都不愿意署他的真名实姓。《金瓶梅》因有海淫之嫌,作者更要隐姓埋名了。明朝万历年间,这部小说的最早的少数读者就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只能作一些猜测。袁中郎(宏道)从董其昌那里借得此书抄本,读后评价甚高,他于万历丙申年(1596)写信给董其昌(思白),想知道“《金瓶梅》从何得来”,大概没有得到明示。他的兄弟袁中道后来记下一个传闻,说此书是京师一个官僚延请的一位绍兴老儒所作。同时的谢肇淛也记了一个相类似的传闻,说它是嘉靖年间一位官僚的门客所作。沈德符从袁中道那里借读到《金瓶梅》,他听人家说,此书“为嘉靖

间大名士手笔”。万历丁巳年(1617)出版的《金瓶梅词话》署作者姓名为“兰陵笑笑生”，显然是一个笔名，还是没有告诉我们真实姓名。

入清以后，人们在前代各种猜测传闻的基础上企图坐实《金瓶梅》的作者，于是各种说法都出来了，较有影响的说法有清初张竹坡评本《金瓶梅》谢颐序中提出的“王世贞门人”，顾公燮的《消夏闲记》说是王世贞，《古本金瓶梅》附录的《王仲瞿考证》说是“王世贞”或者“李卓吾”(贄)，在兹堂《金瓶梅》署作者为“李笠翁”(李渔)等等。所谓“李卓吾”、“李笠翁”的说法明显是无稽之谈，书坊刻书不过想借这两位主张通俗文学的大文学家的名气以壮此书的声势而已。唯张竹坡评本提出“苦孝说”而推测作者为“王世贞”的说法影响最大。

五四运动以后，学者们对《金瓶梅》的作者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郑振铎和吴晗认为《金瓶梅》产生于明朝万历年间，沈德符说它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是站不住的。因而驳倒了嘉靖年间王世贞创作《金瓶梅》的说法。但是近人朱星仍然支持“王世贞”说，他著《金瓶梅考证》详申此说，但缺乏有力的根据。

由于《金瓶梅》引用了嘉靖戏剧家李开先的大量戏文，于是又有“李开先”之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提出这种猜测。徐朔方进一步认为《金瓶梅》与《水浒》、《三国》、《西游》一样有一个长期民间流传的过程，而写定者为嘉靖大名士李开先。此说与“王世贞”说固然不同，但在维护沈德符的“嘉靖大名士手笔”一点上却是完全相同的。

近年又有人提出“贾三近”说和“屠隆”说。

郑振铎在《读金瓶梅词话》一文中虽不同意沈德符“嘉靖间大名士”这个判断的时代限制，认为应当是万历朝，但对于“大名士”的主张却并无异议。他根据《金瓶梅词话》作者署名为“兰陵

笑笑生”，联系小说中存在着许多山东方言，论证兰陵即今山东峄县，他曾仔细翻阅过峄县志，但没有找到有资格创作《金瓶梅》的名士来。近年张远芬从峄县志中找到一个贾三近，贾三近生活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隆庆二年（1568）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张远芬从他的家世生平找出十条理由，证明他就是《金瓶梅》的作者。不过这些理由都不是有力的证据，也只是一些猜测。已有人著文反对此说。持反对意见的文章认为贾三近思想倾向和趣味作风与《金瓶梅》沾不上边，一位被封建社会赞为忠孝仁爱、行宜端直的乡贤怎么会写《金瓶梅》这类为封建社会所不齿的“淫书”？

“屠隆”说是黄霖提出来的。黄霖认为《金瓶梅》的语言从方言角度看相当驳杂，不限于山东方言，内中也有吴越之语，从生活习尚看，则主要有江浙一带的特点。袁中道曾认为小说作者是“绍兴老儒”，黄霖认为应该把目光从北方的山东转向南方的浙江。他发现《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的《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原是屠隆的作品，屠隆也用过“笑笑先生”的笔名，屠隆对于通俗文学有浓厚兴趣，创作过戏曲，采集过民俗风物，生活作风很是放荡。黄霖认为屠隆最有资格写作《金瓶梅》。然而，疑点仍然存在。《金瓶梅》抄录当代人的作品甚多，李开先、李日华、屠隆等的作品都有，并不独抄屠隆一人，故而这个证据不能成为铁证。笔名用“笑笑先生”或“嗤嗤道人”之类也不是屠隆一人，当时风气如此，用这种笔名不过表现了当时文人的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屠隆有戏曲作品传世，如果拿他的戏文，尤其是人物对白与《金瓶梅》的语言比较，就感到迥然有别。屠隆的生活确实放荡，但写《金瓶梅》的人未必就放荡。人们也许喜欢自比贾宝玉，却绝不会自比西门庆，或者借《金瓶梅》来自叙自己的生活。再说屠隆的亲戚屠本峻在《山林经济籍》里还相信《金瓶梅》作于嘉靖

年间,他并不是在他家乡屠家读到此书,而是从外地人家那里断断续续读到,这又应作何解释?“屠隆”说也只能是可备一说,要作出结论还有待于坚强的证据。

回顾种种说法,我认为一般论者没有摆脱沈德符“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这个说法的影响。吴晗推翻了“嘉靖”的说法,但没有论及“大名士”。后来人们寻找作者,总是着眼在“大名士”,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都是大名士。《金瓶梅》的语言粗俗,恐怕是一般大名士所不为而且不能为的吧。我推想这位作者是书会才人一流的人物,传统诗文的修养极其一般,但十分熟悉民间说唱和戏曲小说,且对官僚生活有亲切的体验,所谓门人馆客之说,并非一概是捕风捉影之谈。如果这种假设能够成立,那么这位作者的姓名是一千年也查不出来的。《金瓶梅》的作者问题也就只能是一个斯芬克司之谜。虽然这样说,对于《金瓶梅》作者的探索在学术上却仍然是必要的,有益的,种种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的因素,而且这些考证为研究《金瓶梅》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其学术价值不可因为没有得出科学的结论而加以抹煞。

《金瓶梅》的早期抄本,现在尚未发现,现在所能看到的刻本,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十卷本《金瓶梅词话》系统,一个是二十卷本《金瓶梅》系统。《金瓶梅词话》有明万历丁巳(1617)序刻本,被认为是最早的刻本。原北京图书馆收藏,现存台湾的《新刻金瓶梅词话》,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藏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日本德山毛利氏栖息堂藏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戴鸿森校点《金瓶梅词话》以及香港星海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的梅节校点《金瓶梅词话》,都是这个系统的本子。属于二十卷本《金瓶梅》系统的本子,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和首都图书馆藏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以及张竹坡评本《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等,齐鲁书社1987

年出版的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金瓶梅》，属于这个系统。

十卷本《金瓶梅词话》与二十卷《金瓶梅》的主要不同有四点：1)《金瓶梅词话》保留着大量可唱韵文，《金瓶梅》则基本上将可唱韵文删去；2)《金瓶梅词话》从景阳岗武松打虎开头，依傍《水浒传》的痕迹明显，《金瓶梅》从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开头，独立性加强；3)《金瓶梅词话》的回目、引首不够严密统一，《金瓶梅》则比较严密统一；4)《金瓶梅》修补了《金瓶梅词话》情节中明显的破绽，文字上作了加工润饰。

本书选录之情节片断，皆引自《金瓶梅词话》，以使读者窥见小说的本来面目。

《金瓶梅鉴赏辞典》是一部全面而又细致地赏析《金瓶梅》的大书，它以人物为经，情节断片为纬，由一百七十多个单篇构成，而每篇又可以独立存在。它有诠释，有赏析，也有批评。它是评论，但我们希望评论文字本身也是艺术作品，因此，它饱含着情感。书中编入《金瓶梅》人物表和“《金瓶梅》编年”，这对于检索人物和情节，是会有用的。本书吸收了海内外《金瓶梅》研究成果，并力求有所创新，但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有哪些缺点和错误，当然要由读者、方家来论定。

石昌渝

1988年10月于北京